

·中国书史·

中国版本学及其研究方法

李 致 忠

一、版本学的脱胎与体现

中国版本学,迄今为止主要指的还是古书版本学,晚近图书的版本研究尚没有形成强劲的气候,所以我这里谈的仍是古书版本学。

关于什么是古书版本学,叶德辉在其《书林清话》卷一“板本之名称”中有过如下议论:“近人言藏书者,分目录、板本为两种学派。大约官家之书,自《崇文总目》以下,至乾隆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为目录之学;私家之藏,自尤袤遂初堂、明毛晋汲古阁,及康、雍、乾、嘉以来各藏书家断断于宋元本、旧抄,是为板本学。然二者皆兼校讎,是又为校勘之学。”^①这段话说得模棱两可,谁从这里也难以归纳出科学的版本学概念。但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他把目录、版本、校勘三者的关系联系了起来,并谓:“本朝久治,超轶宋、元,皆此三者为之根柢。”这三者为何?这三者就是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这对我们探讨什么是版本学有很大的启发。

当然,既名版本学,其确切概念应该是起自雕版印书之后,故前人论及版本学多称始自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的确,自宋代尤袤编制《遂初堂书目》,始在一书之下著录多种不同版本。原因是进入宋代以后,雕版印制的书籍已蔚为大观,无论经、史、子、集、佛经、道书,均有许多不同的雕印本行世。版本既多,本与本之间就会产生内容、卷数、文字等诸方面的歧异。读书人为了获取真知,就不能不考究版本的优劣,比勘各种版本之间的文字异同,以便判别是非,寻求真善。为了适应读书人的这种需求,目录学家在编制目录专著时,就不能不改进编目体例,调整著录内容,增添不同版本的著录项目,版本学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地萌生了。这是确切概念的版本学。可见版本学是适应学术的需求而率先由目录学家那里注意到并加以实践的。

其实版本学的这种内涵,并不仅发端于雕版印书之后,而是早在雕版印书出现以前,人们就已有了讲究传本的风气;并且在雕版印书大兴以后,研究版本的人也绝不仅仅就是研究各种印本,而是将稿本、写本、抄本、批校题跋本等的研究

^①岳麓书社,2000年,第21页。

都囊括在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这样说来,版本学的发展似乎应该包括两个阶段:一个是纯抄写时代的传本阶段,一个是印刷时代的版本阶段。全面研究这两个阶段的全部内容,才是中国古书版本学所应承担的全部任务。

《汉书·河间献王传》谓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颜师古给这句话作注曰:“真,正也。留其正本。”^①其意是说,河间献王刘德是位很重视文化遗产的人,他从民间得到好书,一定要很好地抄写一部,送还给原书主人,而将原来的正本留下自己珍藏。同时他还用金帛重价收买天下遗籍,因此,“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故献王“得书多,与汉朝等。”这段记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早在西汉景帝时(前156—141)的河间献王,就已经很注意传本、旧本了。按说,从民间得到“善书”,抄录一部留下自己收藏,就内容而言本无差异,可是他偏偏不这样做,却要好好地抄写一部奉还原书主人,而把原来的正本留作自己珍藏,这无疑是考究传本的先例。“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以求善价,更进一步证明了河间献王刘德重视旧本、传本的史实。刘德为什么要这样?盖有他的道理。中国古时的师承授受关系严密。一家一派的传承,反映着一家一派的学术观点、思辨能力、理论宗旨及文字功夫。一代传人的写本,反映着一代传人的理解程度和理解角度。第一代传人整理的传本,决不会与第五代传人整理的传本完全相同。通常情况下,第一代传人的写本,总比第五代传人的写本更接近原师原意。刘德珍视原来的传本、旧本,道理盖缘于此。新抄不是旧日信息的原载体,可信程度不如旧本令人折服,这显然与后世版本学所重之版本是声气相通的。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刘向受命整理国家藏书。在大规模整理之前,汉成帝曾接受奏请,派谒者陈农到全国各地搜访遗书,从而使群书毕备,为刘向等人的整理工作提供了先决条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这次整理有较细的分工,由刘向总其成。亦有清晰的工作步骤,大体是备众本、校异同、删重复、条篇目、订讹脱、谨编次、撮旨意和撰叙录。显然,备众本成了这次整理工作的首要环节。因为众本不备就无法校订异同;不能校订异同,也就无法删其重复;重复不删,也就无法条其篇目;篇目不定,更无法撮其旨意;旨意撮不出来,叙录也就无从撰写,最后也就无法录而奏之。可见刘向也是十分重视各种传本的。重视传本干吗?重视传本就是为了择善而从,就是为了追求原书原意。

南北朝时的颜之推,在其《家训·书证篇》中也曾在一书之下列举过众本,如“江南本、河北本、俗本、江南旧本、江南书本”等。其意也是说各种不同的传本反映着不同的文字内容,提示人们注意各种传本的优劣异同。此亦为雕版印书出现以前人们就已经考究传本的实例。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三《书籍类》记载唐初经书混乱,“贞观四年(630),敕以经籍讹舛,盖由五胡之乱,天下学士率多南迁,中国经术寢微之至也,今后并以六朝旧本为证。”这也是珍视旧日传本的实例。

^①《汉书》卷五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2410页。

进入宋、元,雕版印书蔚然成风,一书可以有多种不同版本、传本,人们对版本的考究也就水涨船高。元岳浚《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称其曾以家塾所藏唐刻本、晋天福铜板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蜀大字旧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婺州旧本……凡二十本,又越州旧本注疏……,合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最后才付梓雕印《九经》。这更是注重不同版本的实例。

从以上几个实例中不难看出,早在雕版印书大兴之前,人们就非常讲求传本,其意义与雕版印书大兴之后人们讲求版本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同样都是为了汇集众本,以便区分优劣,校订异同。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切含义的版本学概念固然是起自大量的雕版印书之后,但就其内在的真义讲,则是早在公元前二至一世纪的西汉就已经起源了。

上述实例还说明,版本学的真谛是在不同传本的比勘中显现出来的,因而其在自立于学术之林以前,应当是从属于校讎学的,或者说是蕴涵在校讎学之中的。校讎学包括校勘学、版本学和目录学。西汉刘向受命校理群书,首要环节是备众本,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校勘而订讹脱、去重复、条篇目、写定本、撮旨意、撰叙录。而在校勘的过程中,一书的各种传本,其流别系统、篇目多寡、文字优劣等,必会善俗分明,版本学的固有特质便脱胎而出。可脱胎之后,表现在表面的仍然是某一书的一两个版(传)本,校勘者尽管优劣在心,但版本学自身却无以自显。刘向校理群书,开初是否有编制目录的思想,无法稽考,但将这次校理群书过程中为每书所写的叙录析出而集成一书,就成了《别录》。待到刘向之子刘歆继续完成其父未竟事业之后,将析出的各书叙录加以分类编排而成为一书时,则中国目录学史上第一部群书提要目录专著——《七略》便正式诞生了。而《七略》一出,从著录内容,到体例格局和分类方法,均奠定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基础。《七略》凡录一书,必著其著者、书名、篇什、学派、家数、传本等,这样版本学的基本内容和功力便透过目录专著而体现了出来。所以说版(传)本学最初是属于校讎学,通过校勘,辨别出版(传)本的系统源流及优劣异同,从而脱胎而出,然后再通过编制目录专著将版本学的基本内容表现出来。可见版(传)本学自其萌芽时候起,便紧紧和校勘学与目录学连在一起,故探讨什么是中国版本学,决不能脱离它所脱胎的校勘学和借以体现自己的目录学。

长期以来,世人多言版本学,但有系统、有体例地论述什么是版本学,至今还尚不多见。这倒不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学人才子,也不是因为这门学问多么高深莫测,而是因为这门学问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及特殊的运行规律。它常在枯燥无味的校勘中,显现出自身的系统归属、源流所自、文字异同,而后由人们将这些加以整理,撰写成叙录或题跋,再将这些叙录与题跋依类相从编制成目录,版本学就完成了一个运行周期,体现出自身的功用。这种规律是自它产生的那天起就带上的天然特点。由于它只表现工作和研究过程,而无独立形态用以表现自身的结果,表现出来的多是各种不同类型的目录著作,故很不容易为人们所认识和琢磨。试看古今的版本学大家,如晁公武、尤袤、陈振孙、毛晋、钱谦益、钱曾、季振宜、徐乾学、黄丕烈、顾广圻、陈鱣、鲍廷博、杨绍和、瞿绍基、陆心源、丁丙、叶德辉、傅增湘、张元济、赵万里

等等,他们的版本学功力、版本学成果,无一不是透过撰写题跋识语或编制目录表现出来。其实将各书的题跋识语加以类归排纂,最终还是目录。

版本学的基石靠校勘学奠定,版本学的内容和功用靠目录专著体现,因此,其研究的内容也就要受到目录学的制约。中国传统的古典目录学专著也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如果从著录的角度加以分析,这些目录学专著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簿录式的简单目录,一类是著录内容较为丰富的提要目录。简目的性质似是图书的登录帐,恕不详论。提要目录则要把图籍的项目著录得十分详实,诸如书名的命意、篇卷的分合、著者的生平爵里、写作的要义、编撰的体例、版刻的时地、版本的系统源流等等,都要一一加以揭示。提要目录专著这种著录和编目体例,发端于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而定型成熟于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晁、陈以降,提要目录的著录内容、编制体例等虽然也有不小的变化,但总的来看却都未出晁、陈体制。提要目录于图书的这种揭示范围,也就基本上决定了版本学的研究内容,亦无非是从书名的命意、篇卷的厘订、写作的要旨、编撰的体例、成书的经过;作者的行实、科第爵里;版刻的时地、版本的源流、批校题跋、递藏关系等诸方面加以揭示、描述、考订和著录。这样,就又和目录学融为一体了。所以后世有人把版本学又称为版本目录学,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版本学也有自身的脊梁,其核心便是版本的确定,此在宋朝已发其端。只不过那时前代留传下来的古刻旧刊尚少,多为本朝印本行世,考定任务尚不突出。入明以后,特别是入清以后,宋、元都已成为过往的历史,其时所留存下来的写本、印本书,也成了古籍而陌生了。所以考定古书的版本,就成了这门学问的核心内容。在研究方法上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

二、版本学的研究方法

在版本学中最惯用的一个词汇就是“版本鉴定”。“鉴定”这个词的本义是鉴别审定。就是通过鉴定来辨别真伪优劣。鉴,起初是以陶器盛水,借以照鉴。后来换成铜器盛水,再后来则以铜为镜,仍是借以照鉴。所以鉴定总离不开人的眼力和经验,这就难免带上主观的意识甚至错觉,毕竟还不能算是科学。可是它在中国版本学史上,却曾经风行迷漫一时。究其原因,盖是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藏书家极盛。盛的原因,一是做学问的需要,特别是清代考据学大兴之后,为了搜集可靠的资料,学者便尽可能地搜集众本异书,于是藏书家蜂起。二是社会风尚,至尊皇帝、公子王孙、王公大臣、封疆大吏、文人墨客,几乎都要多寡不同地收藏一些古刻旧刊、名人字画、古物碑帖,以示高雅,这样便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受这种风气影响,城镇名门、乡村豪绅、富商大贾,虽然只是粗通文墨,却也要收藏几本好书、几幅名人字画,以附庸风雅。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整个前清,乃至民国。甚至目不识丁的军阀头子也要藏书刻书,经商致富的买卖人居然也插架宏富,四壁图书。这些藏书家,有的为了学问上的需要,不得不再学一手鉴定版本的技能,有的虽无甚学问可做,但为了附庸风雅和茶余饭后的鉴赏,于版本也得说

出个子午卯酉。这样久而久之,版本鉴定似乎就独立了出来,沿着藏书家的道路发展,好象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技能。

为了适应藏书家的需要,社会上便又生出一批书贾。这些书贾有的开张立铺,有的行篋为家。他们为了牟利赚钱,不惜频年奔走,南泛苕船,北游厂肆,乃至走乡串户,苦索冥求。一旦得到宋刻元刊、古写旧抄,又不惜望门投止,送货上门,以求善价。这些书贾,对于书无论是买进或卖出,于版本非鉴定准确不可,否则就要吃亏上当,蒙受经济损失。这样,版本鉴定在书贾行当中也成了最重要而且独立的东西,于是又沿着书贾的道路发展,更演变成了特殊技能。

这两条道路发展的结果,便生出了从印纸墨色、字体行款、版式风格、书口鱼尾、刻工讳字、藏印题跋等诸方面鉴定古书版本的新途径。久而久之,再有人出来加以总结,象明代的高濂、清代的孙从添、江标、民国时期的叶德辉等,于版本鉴定都讲过很精到的话。其后,更有专谈版本鉴定的几本小册子相继问世。版本学似乎真的离开它脱胎的校勘学和借以表现它的目录学而独立成书成学了。好象只要掌握了上述那些纸墨行款等表面特征,就能眼别真贋,心识古今。于是一书到手,便掐指默算行款字数,并用手指测量纸的帘文宽窄,甚至横托书册,抖起书页,审视背面,而后莞尔一笑,默不作声,俨然胸有成竹,却不轻易开口。看去颇似神仙附体,深不可测。待到别人表示了意见,说出了根据,他也念念有词,说出了“真谛”。古书版本鉴定好象至此就算完成了,版本学似乎也就在这种玄妙中真的独立了。

其实,版本鉴定决不是古书版本学的全部内容,且鉴定只靠直观判断也不行。就算是经验十分丰富的人,直观判断也只能说出个大概,绝难说得具体而准确。更难依此做出科学的结论。因为直观判断更多的是靠人的眼力去捕捉书籍表面的风格特征,这就容易在两方面产生问题:一是眼力属于人的主观因素,凡属主观的东西就难免犯经验主义错误;二是书籍浩如烟海,形形色色,通常说来,表面风格虽有时代特点,但特殊情况也实属不少。主观经验与特例相遇,就容易发生错误。所以把这些独立出来,作为版本学的自立体系加以传播,显然是不全面的,说得不好听一点,也把版本学引入了歧途。只有还版本学的本来面目,利用校勘学辨别出版本的优劣,理出版本的系统源流;再运用史实考出版刻时地、版刻主人及刻书缘起;再进一步理出不同版本间的篇卷分合、内容增损、篇目编次等,这才是版本鉴定所应承担的实质任务。这些,岂是经验和直观眼力所能完成!因此,版本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考定、考证,而不是简单、肤浅的直观鉴别和经验主义的鉴定。

所谓考定,就是通过考证而确定。考证需要渊博的知识和较强的查询能力。渊博的知识是考证切入的向导,查询则是获取证据的有效途径。有了这两条,版本学研究就能深入下去,路子就能越走越宽。考证的切入点,与人的知识渊博程度有关,知识越渊博,越容易捕捉可资借镜的证据。但就版本考定而言,通常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1.从序跋入手,获取直接证据:依据古书原有的序或跋来考定版本,这是常用的考证之法,也是最为可靠的考证途径。但这里所说的依据序、跋来考定版本,并

非泛指根据写序写跋之年来断定,而是根据序、跋中记述的刻书单位、刻书人、刻书时地来具体考定。因为写序写跋之年,有时是刻书之年,有时就不是刻书之年,毫无分析地将序、跋撰写年份,一概拿来作为该书的版刻之年,那会产生很多问题。序、跋于古书版本考定极为重要,可又不能一概凭序断年,那到底应该怎样正确运用序、跋呢?序与跋的内容不尽相同,序文多是揭示书的创作缘起、编纂思想、主要内容、编制体例、学术造诣等;跋文多是叙述所用底本、校正情况、雕印经过等。凡遇古书,若要定其版本,就要认真读懂序、跋。凡序、跋中出现“授之梨枣”、“寿之梨枣”、“付之剞劂”、“用钁诸木”、“授之梓”、“梓行”、“镂板”、“刊行”、“镌板”、“槧刊”等字样,更要注意读懂其上下文。因为这些词义都是反映刻书情况的。如果将这些词句的确切含义与序、跋撰写的年份、撰写人的行实、同作者关系等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就能得出正确的考证结论。

2.从避讳字入手,获取参考证据: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王之名或所尊之名,必须采取其他办法加以回避,这就是所谓的避讳。在古书中凡因避讳而形成的文字,就称为讳字。避讳是中国特有的习俗,前后垂两千余年。陈垣先生《史讳举例》说这种习俗“其流弊足以混淆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现存的中国古籍中,除元代写、刻本外,其余唐、宋、明、清的遗籍,均有避讳现象。要利用避讳现象来考定版本,就得熟悉历代各朝的讳法、讳例、讳字,乃至皇帝的嫌名、诸王、后妃的避名,甚至祖讳、家讳等,都要有所知。只有这样,才能识别和掌握讳字的规律,以及因避讳而改姓、改名、改官、改地、辞官、弃举等特点,从而实现确定时地、考定版本的目的。但要牢记所有讳字,熟知所有讳法,也是不大可能的。而且考定古书版本经常遇到的讳字也不需要熟知那么多,用得最多的不过是南北两宋、明末和清前期。元朝是蒙古贵族入主全国,他们虽也有讳法,但由于他们的名字都是译名,遇到名字中间的单字无须回避,全遇译名时才行回避,这样就无全遇译名之时,故书中就表现为没有讳字。讳字的用途,最要紧的是避讳的下限之字,即所谓的避讳至什么字止,抓住这一点,就能利用它来大体确定版本的刻时。

3.从刻工入手,获取参考证据:古人刻书,对刻工的管理机制是计件制,因而刻工每刻完一版都要在这一版版口下方镌刻自己的姓名或单姓单名,以便检查验收时分清责任,决定劳酬照付还是奖、罚。古书上留下的这种刻工姓名,当初虽然没有提供考据的用意,但由于人都有生活的时代和地域,巧而用之,亦可从中获取足资参考的证据。刻工虽属工匠,但亦有姓有名,也有各自生活的时代和地域。一般说来,古人男性寿命大概平均60岁左右,就算一辈子从事刻书,通常也到不了40年,有的可能多于40年,但那是少数,所以假定一个刻工或几个刻工在某一书或几书上出现过,则在另一书再出现时便提供了此书之刻不会早于其他几书的前20年或后20年,这便是有力的参考数据。刻工或一群刻工,常集驻在某一地佣工刻版,但有时也会受雇于周围地区,为另一地的官署、私宅或书铺开版。例如宋代杭州、绍兴、明州等几地的刻工,就常会互相走动为异地佣工。但太远了不可能,因为古时交

通不便,这就为考证某一书的刊印地域提供了考据。刻书的年份一旦有了时限,地域有了范围,这个书的版本考定就算有了基本的说法。

4.从地理沿革入手,获取参考证据:所谓地理沿革,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行政区划的变更,一个是地域的分合归属,一个是地名的变迁。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在一定时间内发生的。例如以北京而言,春秋战国时称燕称蓟,唐时又改称幽州,辽时称为燕京,也称为南京。至辽圣宗耶律隆绪开泰元年(1012),取古人以星土辨分野的办法,以为燕京分野旅寅,为析木之津,故又改称南京析津府。金天会年间(1122—1137)动员民夫80万、兵夫40万,仿照开封汴京旧制改建辽之南京,又称为中都。元灭金绝宋的过程中,中都因抵抗而遭屠城之厄,成为瓦砾废墟。待元世祖忽必烈第二次领兵再来到中都时,至无落脚之地,只好驻蹕金中都东北郊的行宫(今北海白塔山),然后挥师南下,一举灭宋。之后,忽必烈便以此为中心,重建都城,又名大都。明灭元之后,改大都为北平府。到明成祖朱棣以燕王身份从北平府起兵,挥师南下靖难,一举成功,自己做了皇帝,又改北平府为顺天府。盖取顺天应人之意。成祖迁都后,又改称北京。清朝定鼎之后,继都于此,仍称北京。顺天府治所亦设在这里,故亦有直隶顺天府之名。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窃取政权,翌年在金陵成立国民政府,都南京,故又改北京为北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都于此,又改北平为北京。设若我们掌握每次变迁的年份,则书中出现的名称便构成考证成书的证据。成书年份一定,则其版刻之年便一定在成书之后。若还有地名出现在某年之后,而书中仍称前名,则此书之脱稿必在是年之前。前后核考,再结合其它条件,则版本亦大体可定。

5.从机构职官变迁入手,获取参考证据:中国历代所设置的行政、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司法等机构,以及历代这些机构中所设置的官职,不但内容、权限、性质不断发生变化,其名称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例如尚书省,东汉时就有了这种性质的机构,但那时称为尚书台或中台。到南北朝时始称尚书省,下分各曹,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唐代曾改称为文昌台、都台、中台,旋复称尚书省。元代于尚书省时设时废。明、清两代均废置尚书省,使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于尚书省相适应,其长官名尚书令。此名自汉至唐行用了800余年。但入唐以后,因秦王李世民曾做过尚书令,故当他登基做皇帝之后,便废置此官,代之以尚书左右仆射。宋代虽复置尚书令,且班次在太师以上,然均由亲王兼官此职,故形同虚设。明、清两代连尚书省都被废除了,尚书令之官也就无从谈起了。还可以举出无数机构和官职的演变实例,总的都说明机构官职演变是时有发生。我们如果掌握了某机构、某职官演变的历史,或者掌握了这种检索能力,则从机构、职官名称变化上不难发现线索,获取考证资料,从而对某一书的成书及其版本做出大体的判断。

6.从衔名尊称谥号入手,获取参考证据:衔名、尊称、谥号都是对人而言的。衔名是指带着官衔的人名,也就是在古书中某人名出现时其名前所冠的职衔。尊称是对德高望重长者的敬称。谥号是指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迹、特长、为人等给予的褒贬称号。而衔名、尊称、谥号的获得,都是有年份时间的。运用得好,于考定版本

亦不失为佐证。例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礼记正义》卷末,镌有八行参校官衔名,又有校正官衔名三行,其中一行为“朝请郎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司公事黄唐”衔名。考康熙《绍兴府志》,知黄唐上任提举两浙东路茶盐司是在绍熙二年(1191),故此年以前不可能有《礼记正义》之刻。此本《礼记正义》卷末还镌有黄唐跋文,称:“《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讎正,用钁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遗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也证明黄唐提举两浙东路茶盐司是在绍熙辛亥仲冬,也就是绍熙二年的十一月,而刻印《毛诗》及《礼记正义》毕功,是在绍熙壬子八月,也就是绍熙三年八月,算来不过9个月的时间。

尊称有人称,有自称,有时与雅号、别号很难区分。例如明代张居正的《书经直解》,明刻本中就有称为张阁老《书经直解》的。既称“阁老”,那刻本一定是在他入阁参预机务以后的事情了。张居正是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太师。《书经直解》是明神宗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皇帝冲龄登基以后,张居正进讲《书经》时,为使幼小皇帝易于理解和接受,采取元吴澄经筵进讲体,将《书经》释为通俗语言,故称直解。可见此书之成已是万历初年的事了。三朝元老,又日讲皇帝左右,故称“阁老”。可知凡称张阁老《书经直解》者,其刻必在明万历初期以后。

谥号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产物,帝王之谥通常由礼官议上,臣下之谥由朝廷赐予,多数在人死之后很快就上,但也有事隔很多年以后才上的。例如于谦,是明英宗时人,以保卫北京而名垂后世。可是由于他当时反对答应屈辱条约而迎接北狩的英宗回京,故在英宗复辟后身陷囹圄,惨遭杀害。直到万历时,已时隔100多年,才予平反,追谥“忠肃”,故《于忠肃集》之刻,不可能在万历以前付梓。

总之,考证的途径无尽无休,学识越渊博,途径越广阔。版本不是靠鉴定,而是靠考定。鉴定是搞版本学者的基本功,考定才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两者不可颠倒。但也不可偏废,综合运用最易奏效。

三、简单的结论

透过上述的分析,可知中国古书版本学,是以古代图书为研究对象,以确定版本为研究核心,以考证为主要方法,利用校勘学,借助目录学来完成全面揭示图书的任务,并忠实地为中国古代社会各学科研究服务的辅助性科学。明确了版本学的这种含义与概念,有助于研究版本学,也有助于利用版本学。

本文曾在法国远东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其他法国机构联合举办的“中国和欧洲:印刷史和书籍史”国际研讨会(10月15-16日在京举办)上宣读。会议简介参见P. 156简讯。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